

王龍飛，《全民皆兵：太行根據地的武裝體系（1937–1945）》

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366頁。

徐佳恆*

中共革命的勝利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學界聚訟紛紜的議題。而抗戰時期顯然是其中頗為關鍵的時期：經歷挫敗轉戰陝北的中國共產黨在1937年前面臨著極大的生存壓力，而正是在抗戰中實現了組織和軍事力量的大發展。與上述問題意識相類，《全民皆兵：太行根據地的武裝體系（1937–1945）》於2024年出版。本書著重回答兩個問題：一是「中共如何實現武裝力量大發展」，二是「中共如何抗戰」，這兩者又關乎「中共最終如何領導革命走向成功」的議題。

本書主要聚焦全面抗戰時期中共太行根據地的武裝體系，在較為微觀的層面呈現中共武裝在此時期壯大的豐富面向，重點揭示中共武裝的發展演變及運作機制。具體而言，包括了中共武裝體系得以建立的政治環境和戰爭態勢，作為體系根基的太行黨政軍系統，群眾運動和減租減息、糧餉兵員、武器訓練等武裝體系的細部要素，以梯級武裝和軍區制為代表的制度架構，以及中共武裝體系的實際運行狀態——「游擊秩序」。基於對上述問題的討論，本書較為全面地論述了中共太行武裝體系的建立和運行實態。

抗戰時期的太行得以成為中共根據地及武力茁壯的基礎，原因何在？可以認為，太行根據地「全民皆兵」的武裝體系，是戰時中共綜合運用其政治技術

*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

所造就的「系統工程」。¹理解武裝體系的建立，不能不從這個角度出發。如作者自述，民兵之所以發揮作用，正因其處在由八路軍、地方部隊及廣大民眾共同構成的有效協作體系中（頁 363）。²不同於既有研究，本書的主要學術意義與貢獻即在於通過豐富的歷史細節，實際還原革命發展過程，解釋特定的歷史時空中「全民皆兵」得以存在並持續發揮作用的原因。

全面抗戰開始後，依照國共間的協議，中共主要軍事力量奔赴第二戰區。基於對抗戰初期山西國民革命軍大規模潰退帶來的權力真空的敏銳觀察與抗戰設想，中共迅速將八路軍一二九師分散至各地活動，占領日軍未能控制的廣大鄉村，以游擊戰為主要形式，以分散的部隊和地方幹部為主要力量，奪取和改造地方政權、構造黨政組織核心並創建根據地。在此期間，中共的思路基本成形，即發動、組織和武裝群眾，進而依託根據地進行抗戰。由此，中共在 1937 至 1938 年實現了武裝力量的初步發展。此即第一章的主要內容，也是中共武裝體系建立的基石。

日軍為確保華北安定，在武漢會戰後將部分兵力回師華北，於 1939 年展開「肅正作戰」，1941 年後又進一步推行治安強化運動。日軍的行動使根據地的面積和人口大幅度縮減，作戰形態也隨之變化。這既是基於相持階段敵我態勢的考量，也是基於根據地社會資源供給的考慮：一方面隨著日軍對華北城市和交通線的占領，敵我作戰日趨小型化、日常化，非正規軍所能應付；另一方面，正規軍作戰是對軍力和社會資源的大規模消耗，這並非社會資源本就匱

¹ 筆者以「系統工程」一詞來解釋「全民皆兵」的實現，是以太行根據地的「全民皆兵」並非某個獨立政策，亦非某一時期的短暫實踐，而是依託敵我雙方作戰態勢，在前後接續的政策鋪墊中，通過太行根據地的黨、軍、政和社會面細緻配合、政治技術系統運用所形成的細密的社會革命「工程」。筆者以為，本書正是通過對這一「系統工程」的呈現，突破以往「概念化」與「簡單化」的陳舊歷史解釋。

² 大量對抗戰及國共內戰時期中共的研究都簡要提及「民兵」問題，限於篇幅此不詳述，見本書頁 12-21。專題研究如傅秋濤主編，《中國民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鄭訓，《中國民兵史話》（北京：長征出版社，1992）。上述「民兵」專題研究的問題在於：一是將其描述為一項單獨政策，缺少與革命中其他問題的互動和戰爭環境的系統考察，以致流於「簡單化」；二是對「全民皆兵」缺乏細部觀察和歷史細節呈現，導致對其之得以實現的具體情境認知模糊不清，僅將之作為解釋「中共革命為何勝利」的歷史名詞，常常出現於大量官方黨史著作中，從而流於「概念化」。

乏、又經蠶食而嚴重壓縮的太行地區所能承受，因此必須仰賴群眾，通過發動、組織和武裝群眾對日作戰。而其得以在日軍軍事壓力下良性運轉，則是此時中共革命「系統工程」運作的結果。

一方面，堅定的組織核心、政治技術的系統運用及由此發動的群眾基礎、調動的社會資源，為武裝體系的運行提供了基礎性支援，即筆者所謂「大系統」。「全民皆兵」的核心要義是社會軍事化和軍事社會化，是一個考驗中共局部執政能力的社會問題，而非簡單的軍事問題，故如何調動整個社會使之成為革命的一環並長久維持，是確保「全民皆兵」得以存在的重中之重，需要高超的政治技術。具體而言，大致包括群眾運動、減租減息、民兵的糧食、武器、訓練、管理和參軍，即本書二、四、五、七章的主要內容。³

以民眾參軍為例，中共在抗戰時期一直堅持自願原則，只有說服群眾而不能行強迫命令之法，同時又要確保動員參軍的結果（頁 304）。既要求擴軍目標又要求其方式，基層組織便不能不在實際的動員中下苦工夫，想盡辦法打通群眾思想關。後續更需要為參軍民眾及家屬提供支援、進行軍事訓練、隨梯級武裝體系進入正規軍，而這又要與武裝體系中更細部的制度建設、根據地內其他運動的開展以及基層社會的革命化改造等密切配合，並在戰爭環境下持續地加以考驗。如與此前的革命實踐對照，不難發現，這也是蘇區時期紅軍難以常態化大量擴充，反而造成社會動盪的原因之一。如毛澤東 1934 年面對擴紅所反思的，「只討論擴大紅軍和動員運輸隊，完全不理群眾生活，後來就不高興到會了，會議也召集不成了。擴大紅軍、動員運輸隊呢，因此也就極少成績」。⁴由此可見，「全民皆兵」體系的發展不僅源於武裝本身，而且是革命中諸多環節間巧妙配合的結果，可以看作中共革命「系統工程」的產物。

另一方面，如本書第三章所顯示，梯級武裝體系若想持續運轉，需要三位

³ 此外，還包括本書並未收入的群眾運動問題，見王龍飛，〈鬥爭與紮根：太行根據地的群眾運動〉，《抗日戰爭研究》，2024 年第 1 期，頁 27-44。上述內容不僅是武裝體系得以運轉的基礎，中共也通過「全民皆兵」，以軍事化的方式實現社會重構，這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

⁴ 毛澤東，〈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卷 1，頁 137。

一體的武裝體系中正規軍、地方部隊、群眾武裝保持平衡狀態，三者ในระบบ內協調存在，使之不致失衡，此即「小系統」。中共在進入山西之初即已重視發展地方和群眾武裝，但更多著眼於其補充正規軍的功能（頁 31）。但是，如果簡單將群眾武裝看作正規軍的「蓄水池」，可以想見在軍事壓力下，必然迫切擴充兵力以應對「蠶食」、「掃蕩」，更不必說因戰鬥減員和鞏固發展根據地而不斷擴兵。而兵力愈擴充則群眾基礎愈弱，對社會資源的汲取需求愈強，這種對根據地人力、財力、物力的需求與單方面汲取，最終難免「竭澤而漁」，重蹈蘇區時期猛烈擴紅的覆轍，難以持久抗戰。

1941 年「治安強化」而戰爭樣態變化後，中共轉而把重點放在地方部隊與群眾武裝上，指示正規軍「反哺」地方部隊和群眾武裝。⁵正是這一轉變，使中共根據地度過了抗戰以來最為艱難的歲月。同時，也正是對群眾武裝和地方部隊這一「蓄水池」的長期涵養，使中共此後面對大規模擴軍任務時，不致將基層社會「連根拔起」，反而保證了短時間內正規軍得以源源不斷補充。

武裝體系真正發揮在對敵鬥爭運用上時，也需要正規軍、地方部隊、群眾武裝與地方社會的系統協作，形成「游擊秩序」，即第六章。其中的一個典型戰例是沁源圍困戰。在這場持續兩年多的戰役中，中共以其組織動員能力、社會資源汲取能力和社會控制能力，發動群眾「空舍清野」，不僅不與日軍「維持」，反而頻繁襲擾敵方，使日軍的「治安」破產。在這個過程中，沒有正規軍作為主幹力量，中共難以掌握群眾並發動襲擾；沒有民眾和社會資源支撐，沒有民兵作為主要戰力，沁源圍困更是難以實施。因此，武裝體系是掌握群眾與紮根社會的結果，也是保證。對照蘇區時期的實踐則更加清楚，一方面，武裝體系「小系統」的單獨創建並不能作為「全民皆兵」的保障，如若缺乏涵養武裝體系的社會基礎、配套政治技術的系統運用，武裝體系也難以發揮其作用；另一方面，「小系統」的良好運轉亦可使「大系統」在社會彈性內為前者做支撐：武裝體系內上下溝通的平衡狀態保證了社會資源不致因戰爭和供養正

⁵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冊 13，頁 216。

規軍而枯竭。可以認為，上述「系統工程」細緻展現了「全民皆兵」得以實現的過程，突破以往對「全民皆兵」的「概念化」、「簡單化」的理解，從而呈現中共自身發展和抗戰實態，是本書的重要學術貢獻。

然而不能不指出，這一「系統工程」竭力營造的卻只能是一種「弱平衡」狀態。⁶一如沁源圍困戰所顯示，圍困戰的核心在「困」而不在「戰」，共產黨與根據地軍民並不著力於消滅日軍，而是盡可能使之無法實現全面占領。反觀根據地方面「困」的代價卻是極大的：民眾「空舍清野」跑上山去，不僅家業盡失，就連安眠飽腹也非易事，在此種情況下竟能堅持兩年餘，不能不說是對社會韌性、社會資源和中共社會控制力的一次極大考驗。我們不能不承認此種戰爭樣態對於華北持久抗戰和最終勝利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但如果沒有宏觀上二戰戰局的扭轉，在敵我力量對比不明顯而無法壓倒性擊潰日軍的情況下，沁源圍困戰還能持續多久？中共能否更長時間地保持根據地內的平衡狀態而不致崩潰？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在太行根據地的「全民皆兵」，是其依託特定的政治情態、系統整合社會資源和運用政治技術而達成的「弱平衡」狀態。

與蘇區武裝體系相比，抗戰時期太行根據地武裝體系的運作有數個重要前提：長期革命和持久抗戰的革命目標，相比蘇區時期和抗戰中其他地區（如華中地區）較好的社會控制力和社會資源汲取能力，敵方軍力難以實現對根據地的全面控制。在此前提下，「全民皆兵」保持了一個壓力適中的運行狀態。⁷但強大的社會資源汲取能力的另一面，是戰時民眾沉重的社會負擔和極度緊張的社會心理，而中共的社會控制力又不能無端生長，二者間的張力既是中共得以

⁶ 黃道炫針對抗戰時期根據地生存的外部條件，具洞察力地指出根據地生存的「弱平衡」狀態，即中共在日軍「清剿」中保持的「搖搖欲墜卻又堅持不倒的平衡」。見黃道炫，〈刀尖上的舞蹈：弱平衡下的根據地生存〉，《抗日戰爭研究》，2017年第3期，頁4-22。本文所謂的「弱平衡」，指中共武裝體系中各部分之間、以及武裝體系與社會資源間的「弱平衡」狀態。

⁷ 這種壓力適中的運行狀態，一方面來自於日軍對太行根據地統治力的缺乏，另一方面也來自中共方面的努力。舉例而言，本書第六章所論述的「游擊秩序」的重要意義，在於一定程度上維持了戰爭狀態下生產生活的穩定狀態，從而緩解了戰爭對社會的擠壓。因此我們既應注意到「全民皆兵」的「弱平衡」狀態，又不能忽視「全民皆兵」的「韌性」，後者在相當程度上保證了根據地長久的生存和發展。某種程度來說，把握「弱」與「平衡」間的關係，才能深刻理解「全民皆兵」的運行樣態。

成功的關鍵，亦是伏隱其間的挑戰，構成「弱平衡」狀態。仍以上文提及的民眾參軍問題為例，中共對「自願」原則反復強調的另面，恐怕便是實際徵兵過程中仍然大量存在的強制現象，除直接強制外，根據地內民眾被迫服從軟性強制力，恐亦不鮮見。不僅如此，本書作者也已一再注意到太行根據地後備兵員的極度枯竭現象（頁 297-299）。因此，這種「弱平衡」狀態是否能夠長期維持？又是否可以作為勝利經驗而不斷複製？值得研究者深思。

故在此意義上，本書對「全民皆兵」及其背後革命路徑的反思便稍顯不足。舉例來說，沁源圍困戰中，中共通過施展其社會控制力，使民眾與各種社會資源在可控範圍內「支撐」革命。隨著日後革命的演進，特別在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後，這一政治主體轉化為共和國的黨政國家機器，自然也更龐大、更具系統，中共對社會的整體掌控和資源汲取亦更加廣泛而深入。然而隨著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全民皆兵」背後極力調動社會資源、考驗社會承受能力和、藉由改造社會實現政治目標的革命路徑一再重現，成敗幾何？這或許是日後可以在共和國史領域繼續延伸的研究課題之一。

其次，抗戰時期太行的特殊政治形勢、地理環境及組織基礎，決定了「全民皆兵」絕非一帆風順，但另一方面，「全民皆兵」的實踐難度也預示著問題的存在。基於以上兩點，可以想見其中的艱辛和挫折。對反面案例的「解剖」，不僅不能折損「全民皆兵」的革命經驗，反而能從另一面理解「全民皆兵」得以存在之精要，故對此應有更多著墨。

再則，太行根據地武裝體系得以發揮作用，既是中日戰爭形態下的特殊產物，也是因應山西特殊政治情勢的結果，不僅與蘇區時期面對的五次「圍剿」大不相同，亦與抗戰時期華北他省有異。這些都影響了武裝體系運作的具體形態。⁸因此，探討「全民皆兵」，不能不考慮作戰中的敵方形態和該地革命「土

⁸ 日軍以「點」、「線」為主的占領方式，顯然與蘇區時期國民黨軍全面的包圍和封鎖大不相同。這之間的差別易直接影響社會資源的存量，也即影響中共對其的調動能力。抗戰時期各地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生態，亦或是其成敗與否的關鍵，至少也影響其存在形式。參見黃道炫，〈抗戰初期中共武裝在華北的進入和發展——兼談抗戰初期的中共財政〉，《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頁47-63。

壤」所帶來的差異，這些差異深刻影響著「全民皆兵」的經驗複製，如作者自己已經注意到的，晉冀魯豫野戰軍挺進大別山後即遭遇不小的挫折。兩下對比，對於抗戰時期太行根據地武裝體系得以運行的獨特內外因，本書似乎需要進一步做出闡釋，這或許也是後來學者進行不同時空背景下同類主題研究時應當重點關注之處。如此，方能充分地理解中共革命中的「全民皆兵」。